

雪野夜痕

——
丁玲在北大荒
遗迹遗物考

潘光明 刘殿生 吕 品◎著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国家『十二五』规划重点图书·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



雪野夜痕

丁玲在北大著
——
贵亦遗物考



潘光明 刘殿生 吕 品 著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国家『十二五』规划重点图书
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野屐痕：丁玲在北大荒遗迹遗物考 / 潘光明，刘殿生，吕品著. — 哈尔滨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4.8

(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. 第2辑)

ISBN 978-7-5316-7471-9

I. ①雪… II. ①潘… ②刘… ③吕… III. ①丁玲(1904~1986) — 生平事迹 — 1957~1970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7490号

雪野屐痕——丁玲在北大荒遗迹遗物考

Xueye Jihen—Dingling Zai Beidahuang Yiji Yiwukao

潘光明 刘殿生 吕品 著

选题策划	徐永进
责任编辑	李博 徐永进
封面设计	朱建明
责任校对	程佳
出版发行	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地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(邮编 150001)
印刷	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张	12.75
字数	150千
版次	2014年8月第1版
印次	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	ISBN 978-7-5316-7471-9	定价	45.00元
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: www.hljep.com.cn

网络出版支持单位: 东北网络台(www.dbw.cn)

如需订购图书, 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。联系电话: 0451-82529593 82534665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51-51993506

如发现盗版图书, 请向我社举报。举报电话: 0451-82533087

前言

QIAN

YAN



曾经来过

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，丁玲1958年6月来北大荒实属第二次，此前的1948年7月的到来，才是第一次。

第一次，丁玲前后待了将近一年；第二次则不同了，她在北大荒生活了近十二年。

也许是宿命，丁玲活了八十二岁，在北大荒竟生活了十三年。

就是说，丁玲把自己生命的六分之一交给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。

北大荒，是个笼统的区域地名。据《东北古今地名辞典》释：“指今黑龙江嫩江流域，以及黑龙江河谷和三江平原广大荒芜地区。”说白了，北大荒就是如今的黑龙江省，甚至还涵盖了吉林省的一部分。

这样考证北大荒的片量，无非是想证明丁玲在解放战争时期，曾经在北大荒留下过脚印。

对于这段历史，丁玲本人谈得比较多的是《太阳照在桑干河



前言



上》的出版。而丁玲的传记，同样在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一书中浓墨重彩，其他作品中大多轻描淡写。

描述得最为详细的，要算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和儿媳李灵源的《我的母亲丁玲》（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5月第1版）。书中这样记载：



1948年9月，丁玲与儿子蒋祖林重逢于哈尔滨市合影

转自《我的母亲丁玲》

“那是在妈妈来东北之前。（1948年）5月份的一天上午，我去看舒群同志，他是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，住在奉天街东北局宣传部。他说：‘走！跟我去改善改善生活。’我们去了道里的一个西餐馆，长条餐桌边坐了二十多人，原来是《生活报》创刊约稿的宴请。坐在主人位置上的是主编宋之的，他旁边是舒群，我挨着舒群坐着，听起来这份报纸是针对萧军及《文化报》的。我只管开洋荤。”



1949年3月，丁玲与陈明合照
转自《我与丁玲五十年——陈明回忆录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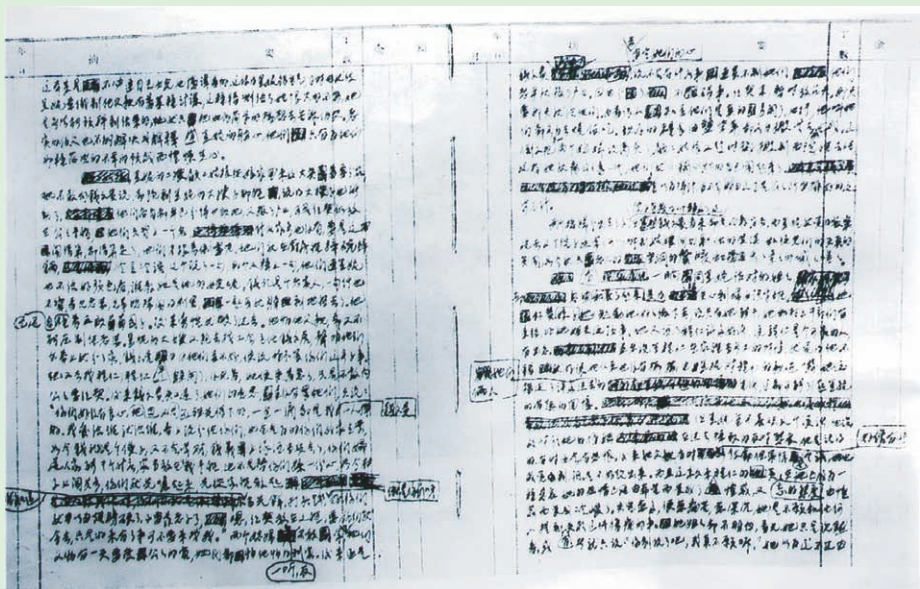
这涉及一段关于批判萧军的历史公案。而且，在后期，丁玲也成为参与者。

萧军于抗战胜利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重返东北。他是“东北作家群”的领军人物，并著有《八月的乡村》，深受广大青年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；曾赴佳木斯东北大学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。后辞去院长职务，来到哈尔滨，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，并于1947年5月4日，创办了《文化报》，中间因参加土改休刊，在1948年元旦复刊。

1948年5月4日，东北局宣传部在哈尔滨创办《生活报》，并在创刊号上刊文《今古王通》，主要针对《文化报》发表的《新年献词》等四篇文章进行批判。

萧军随即在《文化报》发表《风风雨雨话王通》进行申辩。





丁玲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手迹

转自《丁玲写作生涯》

两报的笔战一直进行到10月份。

同年11月20日，由于东北局停止供应用纸，并且不准各机关单位订阅与代销，《文化报》终刊。萧军携家赴沈阳，翌年去抚顺煤矿体验生活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完。

1949年2月23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在头版刊载消息《东北文艺界广泛开展思想斗争，批判萧军反动思想，巩固与提高文艺战线的原则性，对东北文化运动发挥推动作用》。同时，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，在一版发表署名文章《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》。由于文章达三万余言，当日报纸破天荒地临时增加了两大版。

丁玲作为主席主持了东北文艺界批评萧军错误思想座谈会，其他参加者可以说都是重量级人物，如：陈学昭、严文井、

华君武、范政、吕骥、张庚等。丁玲做了最长的个人发言，内容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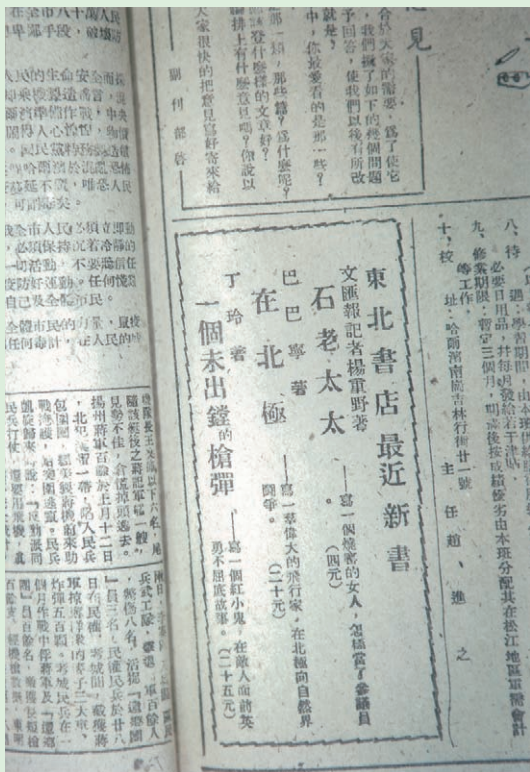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对萧军的批评，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。1942年鲁迅逝世纪念日，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，纪念鲁迅先生，批评萧军思想，会开了九个钟头，我那天当主席。

在文抗，曾经讨论萧军思想，批评个人英雄主义，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。

今天，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，又是批评萧军，又是我当主席。

这样的会，今后是不是还会开呢？我想很难免，还会开的。这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在往前走，有许多新生的力量加进来，也一定有一些老朽的掉下去。我们不希望有人掉队，不愿意开这样的会，但是这样大的队伍，掉队的人总会有的。为了使我们的队伍不受这些落后分子的影响，我们就要开这样的会。

如何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，特别是工作历史较长的人不掉队呢？如何使我们跟上时代，不被时代的大浪潮打下去呢？这就必



丁玲《一个未出膛的枪弹》出书预告
摄自1949年《东北日报》





须要我们在思想上解决几个问题。

文艺工作与别的工作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容易使个人突出。写了点东西，有了一定的工作历史，就会受到别人的鼓动。只要写的东西还多多少少有点用处，就一定有人说“好”。这鼓励的意思，是说你做得对，应该继续走下去。但文艺工作者很容易把这种鼓励变成包袱，背在身上。萧军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。这个包袱别人是不是也有呢？我想也是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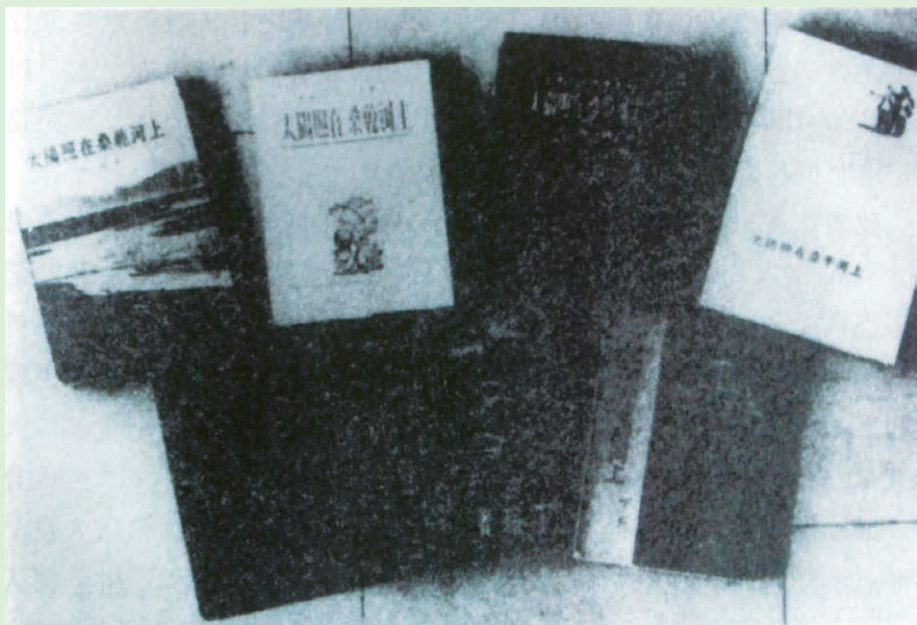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做文艺工作久了之后，容易有自己的一套。他所认为对的、不对的，喜欢的、不喜欢的……都有一套。他这一套是从经验中和工作中得来的。他把这一套表现在创作中，而创作又有了一点成绩的时候，这种东西就固定下来，他就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批评了。

为了克服这些缺点，我们应该认清几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是，文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究竟占何等地位？

有人总是觉得文艺工作不被重视，文艺工作吃不开。这种思想很多人都是有的。而萧军则把这种想法夸大起来，强调起来，这一点上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，因此也就容易得到那些人的同情。

其实文艺工作并不是什么特殊高贵的工作。你写了一部好作品，也不过和工厂里出了斯塔哈诺夫运动的劳动英雄一样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不是领导和群众“看不起文艺工作”，而是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要求人家把文艺特别加以重视。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就喜欢去和别的部门的同志比地位，比待遇，就像萧军说的，“算是哪一级”呢？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，是没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意志的表现！我们不应该计较这些东西！



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各种中文版本
转自《图本丁玲传》

当然，也有个别地区不够重视文艺工作，或者虽然重视文艺工作，但不懂得我们进行工作必须有什么条件，致使我们在工作中碰到困难。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党不重视文艺工作，不懂文艺工作。为了顺利地进行工作，我们要求一定的条件，那是可以的，应该的；但这只能是为了工作，而不能是为了别的，不能是为了个人。

你写了一部作品，就算是写得好吧，试问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？我看是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文艺工作能够发挥作用，不是靠一部作品、两部作品，而是靠整个文艺工作。任何人没有权利要求比别人特别高出一等。

我到苏联，法捷耶夫同志同我说过：“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”但是，我写文章时有意地省去了这句话，没有写。因





为一说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在我们中国总觉得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物。其实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也不过和其他部门的工程师一样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只不过他所担当的工作是改造、提高人们的思想罢了。做了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但是却不关心整个人类的事情，不关心前方打仗，不关心后方生产……而只是关心自己，关心个人的名誉地位，那还叫什么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？我看根本就不配！自己的灵魂都是肮脏的，哪里还谈得上改造别人，教育别人！

妨碍我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的，使得别人对我们文艺工作者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缺乏思想性，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。我们的理论水平很低。例如，萧军在《文化报》上发表反动的、落后的言论，我们许多同志也都看到了，互相谈起来也批评，但是写文章的就没有好多人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写文章就要有理论修养，而我们的理论水平很低，所以就避重就轻，把重担子让别人去担，最后是刘芝明同志写了有系统的批评文章。这在我们说来，是可耻的！或者有人认为我们有分工，批评文章应该让搞理论的人去写。其实这是借口，是我们懒惰，没有责任感，没有热情！

在创作上也是如此。别人总认为我们的作品不好或不够好，而我们的确忙得很。号召下乡，我们就下乡，到工厂就到工厂，上前方就（上）前方，但回来写出东西来，人家还是不满意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水平不高，不能批判当时的生活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。我们的水平，顶多抵得上当时的县、区干部的水平，所以当文章写出来之后，当时的工作已经有的被批

判，我们的作品也就落在现实的后头了。所谓赶上现实，是说不论写过去也好，写现在也好，所反映的问题必须能教育当前，要走在现实前面；而我们则因为政治水平不高，不认真学习，所以总是走在现实后面！

这是不是有办法克服呢？有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挫折道路上坚持下去，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。即使精通马列主义不易做到，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通它几通。这是唯一的出路。

其次，萧军犯了错误，这只是一个例子。我们的队伍往前走下去，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革命进入了新的环境之后，就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，必会有掉队的人。萧军的思想并不是到东北后才坏的，在延安时也并不好；我们在延安也批评过他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他在延安却没犯过这样大的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延安，环境比较单纯，他在那里没有读者，没有群众，没有人支持他，因而他也要不出什么花样来。到东北后情形就不同了。东北是新解放区，旧社会的东西还很多，萧军就和这些旧东西结合了。他的那一套在东北有人叫好，于是他就觉得有了支持，有了力量，因此就发展了他那极端的个人主义，犯了大错误。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十分警惕的。革命形势越开展，局面越大，我们碰到的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就越多。过去我们从上海到陕甘宁边区，曾经以“洋包子”的资格吓唬过“土包子”，现在我们在乡下待了很久，重新进入城市，也一定有人把我们当作“土包子”来欺侮的。新解放区有很多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，其中也许有的看我们的东西不顺



眼，说我们这儿也不好，那儿也不好。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我们就要受人欺侮！另外，敌人会拿旧社会的一套，吹吹拍拍，金钱美女，来腐蚀分化我们的队伍。如果我们不严加警惕，就容易传染上这些东西，被人家拉走！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，要不被这些东西拉走，我们就只有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，老老实实为老百姓做事情，用我们正确的、工农兵的东西抗拒一切非人民群众的东西。

最后，我谈谈萧军是否有前途的问题。

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在群众面前已经彻底垮台了，纸老虎已经拆穿，人们看到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而是一肚子腐化的、堕落的、反动的东西。那么，今后他是否有前途呢？我说只要他有决心改正错误，向工农兵学习，跟着共产党走，他就有出路。否则，他就没有前途。

我们希望萧军能够跟上来，我们愿意帮助他改正错误，但如果他不来，那也就算了。（摘自《东北日报》，1949年3月16日第4版）

座谈会上，刘芝明做了重点发言，题目是《几个不能忽视的问题》，接近八千字。

1949年3月18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发表草明的署名文章《工人座谈萧军的反动思想》。同日，刊发读者来信《读〈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〉以后》。

1949年4月2日，《东北日报》发表张如心的署名文章《反对萧军思想，保卫马列主义——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？》；同

年4月3日,《东北日报》用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《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?——评萧军的社会观与人性论》;同年4月5日,《东北日报》用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《是“箕豆相煎论”,还是阶级斗争论?——评萧军的政治观》;同年4月6日,《东北日报》用了近乎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《是仇视人民反共反苏,还是热爱人民拥共拥苏?——评萧军对人民、共产党、苏联的态度》;同年4月7日,《东北日报》用了近乎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《是极端的个人主义,还是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?——评萧军的个人主义》;同年4月8日,《东北日报》用了近乎一个整版刊发张如心的署名文章《结论:只有马列主义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》。

1949年4月,东北书店出版刘芝明批萧文章《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》的单行本。

批判萧军在逐步升级。

不久,东北文艺协会发表了《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》;东北局最后发表了《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》,给他加上了“反苏反共反人民”的罪名。1980年4月21日,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宣传部批复北京市委组织部与宣传部《关于萧军同志的复查结论》,为萧军平反。时隔三十多年之久,萧军才恢复名誉,重返文坛。

这是一场悲剧。

陈明对这段历史做了特别说明。这段话很特别,他是在讲到“去东北”这段经历时,在与萧军毫无瓜葛的情况下,突然插入的。令人感到突兀。这应该是陈明替代丁玲因参与批判萧军这段



公案所做的解释。陈明是这样讲的：

顺便说一说萧军在东北的情况。

萧军初回东北时一度受到批判，是有历史原因的。在延安的时候，有一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，他就说过，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，共产党和国民党。当时正是整风、批判王实味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个态度，他反对批判王实味。丁玲反驳他说，你是孤家寡人，共产党有千军万马，你一支笔怎么管？舒群、罗烽、白朗也都觉得他过分了。他的夫人后来写回忆录，说萧军当时挑灯夜战，舌战群儒。那不符合事实，根本没有“挑灯夜战”。那次会是在黄昏时散的，散会后胡乔木、柯仲平、丁玲和我四个人一起走，柯仲平对丁玲说：“丁玲，你今天的表现有点‘左’。”胡乔木接着说：“丁玲一点也不‘左’，倒是你有点‘右’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党派了大批干部去东北。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间比较长，搞奴化教育，东北有一部分人有洋奴思想，认为什么都是日本的好。针对这一情况，我党感到，新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要，所以派了很多文化人去东北，东北籍的文化人首先被挑选。萧军、舒群、罗烽等就这样去了东北。萧军回东北比较早，当时交通困难，是彭真用车把他接去的。他对当时驻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有部分人不守纪律、乱搞女人非常不满，公开批评。他提出要办报，中央批准了，他就在报上批评。罗烽、宋之的等东北作家觉得萧军不识大体，不是说我们容忍这样做，而是当时的形势下批判苏联红军不合适。当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刘芝明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对萧军提出批评。我认为刘芝明不是极“左”类型的人，丁玲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接受审查时，搞什么活动都不让她参加，而

刘芝明只要有什么文艺活动都邀丁玲参加。他对艾青也很好。有人对他在反右时的表现不满，反右时刘芝明已经在文化部工作，他找新风霞谈话，要她和吴祖光划清界限，说如果不划清界限，右派帽子就在这里，可以随时给她戴上。吴祖光对他不满，也对丁玲不满，因为丁玲有一篇文章讲了刘芝明的好话。我觉得吴祖光的态度可以理解。

彭真对萧军一直很好，也比较理解。

后来萧军想到北京来，但是没有东北局的介绍信，没有介绍信就不接收。他就自己跑到北京来了，还是找到彭真，彭真那时是北京市市长，就安排他到北京的参议会。萧军这个人有骨气、直爽，有他的长处，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太过头了。丁玲与萧军私人关系挺不错，他们俩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：直，有什么话，当面直说。（陈明口述，查振科、李向东整理《我与丁玲五十年——陈明回忆录》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



1955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，丁玲被打成“丁玲、陈企霞反党集团”首要分子。1956年夏，丁玲与陈明住到颐和园云松巢去写申诉和检查，照片摄于云松巢走廊上

转自《我与丁玲五十年——陈明回忆录》



